

五策并举 应对碳减排与高油价双重困局

■ 胡俞越 刘晓雪 谷庆林

后危机时代，以建立“高效、低能耗、低排放”发展模式为核心的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我国对此高度重视，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已经起步，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也已提上日程。但经济发展长期严重依赖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均落后于发达国家等现实因素，让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一方面，低碳时代高油价及全球通货膨胀之势难以逆转。低碳将继续推高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进而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给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带来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压力。

具体而言，从长期来看，碳减排会引发石油等矿物能源使用量的调整，但在短期内石油需求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因为受核心技术和成本的制约，各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加之石油等矿物能源储量日益减少、新能源目前还难以形成根本性替代，石油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必然是上涨的。同时，某些石油生产国提出，它们自愿减少石油开采和挖掘，但是需要巨额补贴作为补偿，这种行为若被诸

多生产国效仿，石油供给就会明显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减少也会引起石油价格大幅攀升。此外，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低碳技术发展初期成本较高，为迅速推进低碳技术市场化，发达国家有动力继续推高原油等化石能源价格，使低碳设备及产品具有相对价格优势，从而借机向接受低碳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转嫁不菲的研发成本。

高油价趋势无法逆转，而钢材、绿色农产品、化工等行业还得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节能增效、引入清洁机制或进行技术创新，这些措施无疑都将间接增加生产企业的成本，助推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会波及到中下游产业，以乘数效应向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加速传导，其结果是引发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可能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物价上升还会推高劳动力薪资水平，使我国制造业面临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双双上涨的局面。同时，产品成本增加必定会给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带来极大影响，造成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国民经济增长放缓。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

对于碳减排技术和碳配额需求最强，但供给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处于弱势，因此面临巨大的碳排放权风险敞口，急需碳排放权风险管理工具。而且，美元疲软、低碳经济和后危机时代刺激经济策略推动油价和以油价为基础的大宗原材料价格攀升，将带来多种敞口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不具备碳减排的资源禀赋优势及技术优势，能源利用水平低下，低碳技术尚未形成竞争力，低碳产业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

我国的能源结构是“贫油少气富煤”，能源利用中煤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煤炭是矿物能源中碳排放最多的品种。同时，我国的能源利用水平低下，单位能源GDP产出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单位GDP碳排放也远高于国际水平。

在国际发展趋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或者说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是继续以化石能源为基础，主要通过碳收集和碳储存技术，减缓因化石能源燃烧而产生的温室效应，达到降低碳排放和污染率的目的；二是不再以化石能源为基础，而是寻求风能、核能和

太阳能等新能源,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目前来看,我国在上述两条发展路线上均不具有技术优势。虽然我国进行了清洁发展机制、碳减排和新能源技术创新的尝试,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较强的低碳技术,在低碳经济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同时发达国家封锁低碳核心技术或以高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我国尚被排除在“核心技术俱乐部”之外。

在碳减排和高油价共同构筑的困局中,我国应积极应对,变被动为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逐渐在全球低碳经济中占领一席之地。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引导、金融产品的支持、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积极的市场开拓都是逐步破除低碳技术壁垒所不可或缺的。

1. 先节能后减排,奖惩并举推进低碳政策实施。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节能理念在我国企业中被广泛接受,但减排政策推进较慢,这与企业利益诉求有关。尽管“节能”可以压缩企业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但“减排”一直被企业视为长期经营的额外负担,短期内技术和设备的投入也是企业的重大顾虑。因此,我国制定和执行低碳政策时,可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推进提升企业效益的节能工程,再推进提升企业形象的减排工程。同时,为强化企业执行低碳政策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可以考虑采取奖惩并举的策略。对高效推进节能减排的企业,由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或税收奖励;对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征收碳排放税,并将其用做低碳政策的运作资金;对坚持高耗能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则要坚决关停。

2. 国内与国际兼顾,步步为营开拓新能源市场。长远来看,新能源是关系国际政治经济走势的战略性问题。我国的能源结构与其他国家迥异,新能源技术也总体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我国应该既照顾本国特性发展低碳技术,又要着眼全球开拓新能源市场。针对我国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应加大力度研发适用于煤炭资源的低碳技术。在这方面,清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应用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帮助其迅速产业化。目前,我国在太阳能、水能、核能利用领域都已取得重大进展,生物质能源则在农村沼气项目和新兴生物燃料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下一步可以加强对新能源的市场化开发,用在新能源市场的回报继续投入深层次新能源开发:如核聚变技术突破、安全高效利用氢能技术等。如此步步为营,我国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新能源技术的垄断,掌控未来新能源的国际话语权。

3. 占领节能市场制高点,提升中国制造品牌形象。中国制造虽然行销全球,但是品牌和科技附加值的缺失一直使我国产品定位低端。低碳时代,节能成为主导潮流,可以预见未来节能产品市场将空前庞大,节能可以成为我国产品树立品牌特点、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突破口。节能汽车、电器等消费品和节能生产线等生产工具都可以成为企业全力争取的市场。此外,还要提高居民节约资源能源、注重生态环保以及切实采取行动的意识,向全社会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这对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还可以拉动内需,创造低碳消费品市场。

4. 为低碳产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无论是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改革还是新能源创新,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政府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固然必要,但是完备的金融支持才是企业保持创新动力和能力的最重要保障。我国应对低碳产业开放资本市场,提供全面的融资支持。不仅银行贷款、创业板上市、企业债券发放三类主要融资模式都要到位,还要积极培育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群体,为创新型的低碳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5. 推进衍生品市场创新,争夺国际碳交易市场“话语权”,强化风险管理能力。面对碳风险和多种商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我国亟待迅速推进基础衍生品市场建设和碳交易市场创新。目前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经较为完善,但期权和金融期货尚未放开。全球通货膨胀局面下,我国实体经济需要这些基础衍生产品来对冲原料、库存、股权、债券及外汇等商品的敞口风险。虽然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只取得原则性协议,并未确定总体的碳排放额分配,但这并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碳排放市场的繁荣。一旦各国的碳减排任务明确,碳排放指标将成为稀缺资源而大幅升值。我国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需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掌握话语权,这就要求尽快培育与国际接轨的碳金融市场。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必须加大碳排放交易产品的金融创新力度,加快环保期货、期权和互换合约的创新步伐,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碳排放额度及信用产品,提升低碳市场的运作效率和低碳产业的风险管理能力。^[1]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责任编辑 韩璐